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选择的国内外经验及启示

王克岭[1]

【摘 要】：活化利用是保护传承弘扬古驿道文化的有效举措。保护、开发、利用好古驿道文化资源，把丰富的遗产羽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产，能更好地发挥古驿道文化振兴的深层次基础性作用。本文梳理古驿道文化资源及其活化利用模式的相关文献，旨在厘清古驿道文化资源类型、意义和渐次更替的活化利用模式到底是什么。选取中国南粤古驿道和徽杭古道、秘鲁印加古道、新西兰夏洛特女王步道，审视国内外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立足基础、体制和动力视角，为我国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选择的相关决策提出如下观点：模式差异的根源来自基础的不同，并决定了活化利用的目标分野；模式差异的拉力来自体制的不同，并决定了活化利用的做法各异；模式差异的核心来自动力的不同，并决定了活化利用的治理差异。

【关键词】：古驿道文化资源 活化利用 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F592；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22)06-0005-10

一、引言

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地貌、气候复杂多样。在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辽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等恢弘的地理空间中，孕育出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这其中，植根于特定民族或地域的古代、近代交通网络及其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见证交通文明发展史，就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史。[1]换言之，交通文明是人类文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包括古车、古船等交通工具和古驿道、古运河等基础设施构成的中国古代交通体系中，作为陆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古驿道，兼具运输、贸易、军事等多种功能属性，不仅融通了人流、货流、信息流等资源，而且在古代乃至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1]**作者简介**：王克岭，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旅产业管理。（云南昆明 650091）博士后合作导师,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出站博士后。入选云南大学“东陆人才计划”,2018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曾在 MITSLOAN 从事高级访问学者工作(IFF),现任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复杂科学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云南省智慧旅游工程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20 年)、西部项目(2008 年)和一般项目(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2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项目(2018 年)等。在《光明日报》《中国旅游报》《产业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IJHM)、Tourism Economics(TE)、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JHTM)等刊物发表论文 70 多篇。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代表性成果有《茶马古道:世界屋脊上的文明见证》《微观视角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提升发展对策》《创新驱动下旅游发展的动能与路径》《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等。多年来致力于文旅产业领域的问题研究,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旅游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以下观点:“作为大陆上唯一还在部分运转的文明古道,其多样性和独特性并存,因此茶马古道被誉为‘亚洲的天堂走廊’。实践中在促进遗产资源整体保护的同时,共同打造茶马古道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人与自然相生相伴、和谐共处的大型遗产公共空间。”“在文旅产业发展中应重视对文化生境的保护。”“深化内涵、创新业态、增强外溢是我国旅游业获取新动能并成功转型升级的三大主要任务。”“我国首倡的国家文化公园是讲清楚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国家发展目标的精神空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滇藏茶马古道文化资源整合与旅游活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AJY017）

随着公路的兴起和扩展，古驿道渐次被现代交通取代了，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交通功能。但在历史上，它们不仅是连接多地域商品流通的线路，而且是各民族友好往来、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不同文化在古驿道及其周边区域汇聚和交融，塑造出独具魅力的古道文化。华夏大地上众多古驿道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使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保护、传承好古驿道沿线的文化遗产，让人们在理解与阐释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传承，更好地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显得尤为必要且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古驿道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的相关文献，旨在厘清古驿道文化资源类型、意义和渐次更替的活化利用模式到底是什么；其次，选取中国南粤古驿道和徽杭古道、秘鲁印加古道、新西兰夏洛特女王步道为研究案例，审视国内外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最后，从基础、体制、动力视角，揭示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的差异性，旨在为中国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相关决策提供一些建议。

二、相关文献述评

（一）古驿道文化资源

根据《辞海》（第 7 版）的解释，古驿道是指古时通行传车、驿马的大道，沿途设置驿站。至 1913 年，新邮政替代了传统的邮驿制度，驿道逐渐被铁路和公路所取代。唐曦文等（2017）[2]认为，“古驿道线路”是以古驿道为载体，集沿途城镇、村寨、驿站、桥梁、码头、关闸等遗存在内的线性文化景观。喻晓蓉（2021）[3]认为，古驿道线路属于线性文化遗产范畴，其构成包括古驿道本体、附属设施以及连接线。[4]作为历史上“空间的社会生产”和“空间的社会建构”产物，古驿道线路不仅是被生产、使用和消费的社会空间，而且是使社会时空张缩的交通传播媒介。今天，虽然古驿道线路的交通功能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但其价值在旅游产业发展、地域文化传承、区域经济合作、民族与政治认同等方面得以彰显。[5]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是空间的“时间”维度[6]，包括古道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积淀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历史长河的历时演进中，多维度的商品、知识、思想和价值观持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与互惠滋养，孕育出古驿道沿线丰富的文化遗产，其遗产体系是一个涵盖静态型资源、动态型资源和重塑型资源，且与其所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辅相成的整体。静态型资源包括驿道（道路、桥梁、渡口等遗存）、与产品生产相关的设施或遗存（手工作坊、茶园、盐井等）、历代官方治理的相关设施（城池、哨所、兵营、税卡、驿站等）、与民间贸易相关的设施（商号、车马店等）、与文化交流相关的设施（宗教建筑、摩崖石刻和碑刻等），这一连串曾长期服务于丝绸、茶、盐等产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目的的点状遗产集群被线状遗产串联了起来，使它们成为地点类型丰富、展示特定历史现象的意义功能载体。动态型资源是指蕴含在古驿道沿线民众生产生活生态中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如歌谣、舞蹈、祭祀仪式、口述历史、民间传说、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风民俗等。这些沿线民众的生活化或生产化实践活动，是他们祖祖辈辈传承的生活形态、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的具象化展示，它们被不断地再创造，为社区和族群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重塑型资源是指古驿道沿线的地标性遗迹或特色性建筑形式等资源的原址或迁移重构体，这些具有地方感、历史文脉和地标意义的重塑型资源，是对族群地域性场所精神的表达和呵护，让无数对它情有独钟的人们，重新找到心灵的归宿。[7]这其中，对核心资源的保护、对核心资源的横向拓展、对核心资源与周边环境的协调都成为推动古驿道线性遗产空间生产和建构的重要抓手。

（二）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

活化利用（Adaptive Reuse）源于 1979 年颁布的《巴拉宪章》，即“为建筑遗产找到合适的用途（容纳新功能），使得该场所的文化价值得以最大限度传承和再现”。近年来，学界围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方式和路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旅游活化成为实现遗产活化利用的主要形式之一。国内关于文化遗产旅游活化研究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供给方主导文化遗产的旅游产品开发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到与生产性保护并行的转变。张晓萍（1998）[8]指

出，利用好历史、宗教、民族等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出具有文化价值的旅游产品，如图书、书画作品、图片、纪念品等，使旅游活动充满文化内涵；节事活动能高度浓缩地方性文化内容，通过舞台展演对地域文化、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9]通过打造旅游吸引物（如展示品等）的方法，将文化资源活化为文化资本。[10]这一时期，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是以供给方主导的文化遗产的旅游商品化为主要特征，通过景区、博物馆、节事活动、仪式展演等载体或形式，实现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

2.社区参与的整体性活化利用

遗产整体性保护是以政府主导的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产品的单向供给为主，仍存在执法力度不够[11]、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冲突[12]、社区居民安置等问题。[13]随着活化利用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社区居民作为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持有者和传承者，成为遗产地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关键主体，应健全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机制，为在地居民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机会。[14]这一时期，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方式以社区参与的整体性保护为主要形式，以原真性、整体性保护为主要特点的民俗（族）文化村、历史文化街区、生态博物馆[15]、活态博物馆[16]是该阶段的主要模式。

3.游客深度参与的文化旅游价值共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市场逐渐从产品主导逻辑转变为服务主导逻辑，“企业等供给者创造价值，游客消费价值”转变为“企业和游客共同创造价值”[17]，数字化技术与旅游发展的互嵌性日益加深，文旅消费呈现出全要素、全人群和全天候的新趋势。[18]基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游客深度参与文化旅游价值共创，是这一时期遗产活化利用的主要形式，数字博物馆、虚拟文化游、旅游虚拟社群、旅游直播、文旅短视频等是该阶段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主要模式。

综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活化利用的对象从单一的建筑遗产拓展至街区、村落、城镇、城市、文化线路等，活化利用的内容从物质文化遗产延伸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二者兼具。[19]作为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的载体，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对其内涵的活化弘扬，对于彰显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进而推动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

文化是文明的载体。富集生态文化、水利文化、交通文化、商贸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形态的古驿道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我国地域广阔，古驿道遗存类型丰富多元、数量庞大，因此亟需探索将国际遗产保护理念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和路径，以进一步推进古驿道文化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

（一）广东：南粤古驿道

1．背景

自秦汉至清末接续修建的南粤古驿道，肇基以来就是联通中原与岭南、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被誉为广东千年文明史的“活化石”。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驱动的时空张缩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呈线性分布于南粤古驿道两侧的众多珍贵文物古迹等文化资源被纳入遗产保护与传承规划中。这其中，有的熠熠生辉被人们所熟知，有的则因为位置偏远、环境闭塞、生态脆弱等因素而“养在深闺人未识”。为留住文化根脉，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文化强省战略要求，遵循真实性、整体性、发展中保护等原则，按照“驿道+农村建设”“驿道+扶贫”“驿道+文化”“驿道+体育”的思路，肇始于 2016 年的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工作在岭南大地上渐次展开。

2．难点

南粤古驿道绵延 1.12 万公里，贯穿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103 个县，规划节点 1200 多个。面对如此体量的线性遗产资源，如何围绕平台、项目、产品等细节来精准施策，使之既能向上对接文化强国与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又能向下满足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组织、规划工作等成为广东各界亟待破解的问题。具体而言，如何构建大尺度下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多元互动体制机制，积极而有效地推动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如何规避驿道本体与生态环境在开发中遭致破坏？如何平衡好特色景观营造与居民生活化、生产化利用的问题？如何激发或满足居民的参与感、获得感？这些问题都成为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难点、痛点或堵点。

3．主要做法

（1）从生态修复到资源摸排，摸清活化利用新家底。2016 年，保护利用工作启动伊始，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化厅等发布了《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保护与修复指引》《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标识系统设计指引》《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保护与修复费用计价指引（试行）》，对五种类型（山地型、平原型、滨水型、村镇型、古水道）、五种等级（基本完好、轻微残损、严重残损、覆盖、灭失）的古驿道保护与修复工作作出了统一部署，通过拟定规范的标识系统、提供费用计算依据、明确 26 种古道修复做法等举措来推进保护修复工作的有序开展。截至 2021 年 10 月，广东省已完成 18 条 28 段 1280 余公里古驿道的修复任务。与此同时，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加强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音像出版社等学术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通过田野调查、工作坊等方式，推进古驿道文献整理、资源摸排与数据库建设等工作，以摸清活化利用的基本盘。

（2）从生态建设到线路规划，创新活化利用新范式。南粤古驿道周边区域覆盖 138 种动物和 600 多个古树群，立足“打造永不落幕的自然历史文化博物馆”的目标，按照拟定的地质灾害治理方案等开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沿线生态的保护修复。在线路规划上，立足生态保育、乡村振兴、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和战略背景，将沿线 959 处人文节点与 248 处自然节点统筹规划，通过特色文化廊道、科普长廊、旅游休闲带、主题线路等路线规划，将古驿道建设与生态工程、文化工程相结合，推动基于模式创新与范式创设的南粤古驿道保护修复和重点线路规划建设，并因此斩获了 2019 年度中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

（3）从“活起来”到“火起来”，树立活化利用新典范。在活化利用中，成立了由 11 家科研单位组成的“古驿道研究中心”，通过加强对空间流动、交通文化、动植物、防灾减灾等领域的理论探索，不仅补齐“古道学”研究匮缺，出版了 13 部古驿道研究专著、189 篇学术论文，而且指导了古驿道的保护利用工作。与此同时，依托所创设的多个古驿道实践基地，采用动植物科普、历史研学、少儿绘画、定向大赛等形式，带动了以青少年等核心人群为主的百万人次走进沿线村镇开展体验参访；依托南粤古道网等线上资源，采用云研学、文物科普展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发布信息，通过“可游玩、可阅读”的线上体验传递古道好声音、讲好古道好故事。

（4）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激发活化利用新智慧。2017 年 11 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文化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省统筹，地方为主”的建设思路，从信息共享、资金筹措、土地供应、政策供给、公众参与等多维度出台激励引导措施，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单位、社会公众参与到南粤古驿道的建设中来。实践中，依托“三师”专业志愿者协会，广大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义务参与到古驿道的各项工作中，开展“驿站”“驿亭”等“大师小筑”设计施工，集聚社会资源和智慧，打造古道遗产新空间。此外，通过调研走访、座谈交流、政协提案等多种形式，听取相关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专家学者等意见建议，以更好地凝聚各方共识，汇聚各方智慧，为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加油鼓劲。

（二）安徽和浙江：徽杭古道

1．背景

徽杭古道是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齐名的我国三大古道之一，这条西起安徽宣城绩溪县、东至浙江杭州临安区，全长25 公里的古道，是古时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枢纽。斗转星移，一代代徽商、浙商在这条山路上饱经风霜、肩挑背负，创造了“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商业传奇。

早在2009年，宣城市就启动了5.2亿元的投资计划，用于徽杭古道的旅游开发。时至今日，旖旎风光与人文渊薮并存的徽杭古道已成为徒步者的天堂，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A 级景区、体育旅游十佳精品路线、全国驴友休闲示范基地等殊荣于一身。随着“遗产热”“文化热”的兴起，皖浙两省在拟定本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时，均将徽杭古道置于本省文旅发展的战略布局中，赋予古道以新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2．难点

目前，徽杭古道的保护利用工作正朝着积极的方向稳健发展，但仍存在主管部门重视不够、地方财力不足、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制约因素。[20]实践中，产业开发与旅游参与等行为对沿途乡村人居环境也带来了负面影响[21]，强化遗产的经济功能导致遗产被过度开发甚至被破坏。[22]此外，徽杭古道地跨安徽、浙江，虽然两省均高度重视古道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但是高位统筹、有序推进徽杭古道整体发展的协商沟通机制仍未全面建立。

3．主要做法

(1）从点线连接到全域串联，拓宽活化利用新范围。

在全域旅游的时代语境下，徽杭古道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不再局限于单个景点、景区的服务提升，而是要立足纵向与横向的功能组合与空间拓展的高度，引导不同区域、不同业态文化资源抱团发展，推动跨区域文旅经济共同体建设。

在纵向深化古道原有徒步游功能方面，杭州提出了构建包括徽杭古道在内的 5 条“天目山行”登山道；宣城提出了以徽杭古道、旌歙古道等8条古道为依托，打造黄山东麓古道群的徒步游精品线路。

在横向拓宽古道的空间功能方面，杭州市提出了以清凉峰山地公园为核心，串联徽杭古道、浙西大峡谷、浙西大龙湾、十门峡等九大景区，打造集“山地探险、户外运动、山地徒步”于一体的特色文化旅游带；宣城市提出打造串联徽杭古道、绩溪县城、徽菜文化园等11处重点旅游景区（点）的“徽式休闲”之旅，以及串联徽杭古道、鄣山大峡谷等7处景区（点）的皖浙天路文化廊道。

(2）从感受美丽风景到营造人文氛围，深耕活化利用新领域。

以古道文化为核心，整合沿线景区、村落、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拓展古道在休闲、康养、研学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古道+”旅游项目，打造徽杭古道品牌。

杭州市提出深挖古道历史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内涵，以徽杭古道、吴越古道等为载体，开展研学产品培育工程，重点打造“三个基地”（红色/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基地）；开展国际性山地运动户外挑战赛、定向越野巡回赛等高水平赛事，培育“杭徽古道——清凉峰古道国际徒步大会”活动品牌，同步开启征文、摄影比赛，提升古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宣城市提出串联古道周边自然景观、历史古迹、文化名村，围绕“体育+文化”主线，打造国家级体育旅游产业基地，开展徒步、探险、山地自行车、露营等户外运动赛事与项目，借助朱熹、胡雪岩、胡适、陶行知等徽州历史名人，塑造“贾道儒行”的主题形象。此外，探寻江南第一关、大会山、旌绩边游击根据地等重点区段上的文化记忆，开启赓续革命精神的红色印记之旅。

（3）从存量提质到增量调整，激发活化利用新动能。

在资源整合与项目开发上，皖浙两省各自发力，从存量资源与资产的整合、文物修复、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着手，将整体提升提上议事日程。需要指出的是，两省均将古道融入各自城市景观的规划之中，力图将影视、摄影等现代元素植入古道的发展中，激发古道资源活化利用的新动能。

浙江的古道资源整合与提升项目包括：拟投入 5 亿元财政资金，开启部分遗址的恢复；修建旅游服务设施，重点发展颊口、玉屏等沿线村庄的餐饮、购物、民宿等业态，提升旅游接待能力；举办特色旅游活动，打造全国户外徒步品牌线路。安徽的古道资源整合与提升项目包括：景区沉睡资产的盘点与盘活、传统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户外主题旅游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古道文物的保护与修缮、重点景区服务能力的提升等。

（4）从规划引领到法律规制，构建治理权威新高度。

作为国内跨省域的知名古道，徽杭古道引起皖浙两省的重视。从 2011 年绩溪与临安联合主办中国徽杭古道文化旅游节，拉开两地合作交流的序幕，到 2019 年绩溪、临安政府《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两地在打破行政界线、共同打造徽杭古道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工作上掀开了新篇章。

幽幽古道，向“新”而生。浙江省率先发力，基于古道众多、保护刻不容缓的省情，秉持强化保护、规范利用的初衷，出台了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性法规。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包括杭徽古道在内的浙江省内 1200 余条古道，在长效保障机制、行为规范、价值传播等方面有了法规指引，构建了古道综合治理权威的新高度。

四、国外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

国外对包括古驿道在内的线路型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起步较早。专司《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于 1976 年。截至 2021 年 7 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总数量为 1154 个，其中，“线路型（route）”遗产 357 个（文化型 273 个、自然型 71 个、混合型 13 个）。[23]欧洲委员会于 1987 年实施“欧洲文化线路”计划以来共认定 45 条文化线路。[24]上述“公约”和“计划”在发掘共同遗产，促进文化互动、宗教对话、景观保护和文化合作等方面成就显著。通过对案例考量，选取秘鲁的印加古道、新西兰女王步道的保护利用模式进行阐释，旨在为中国的古道保护与利用提供镜鉴。

（一）秘鲁：印加古道

1．背景

1438—1532 年，以库斯科城边的萨克萨瓦曼圆形古堡为起点，印加帝国沿安第斯山脉修建了一条山路——印加古道，它是统治者发布政令、传递信息以及人们生产、生活和经贸往来的交通动脉。广义的印加古道，途经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 6 国，全长约 3 万公里，其中 7000 公里路段保有古迹、遗址，如秘鲁境内的古道沿途有 81 处考古遗址和 156 个土著人社区。狭义的印加古道，是指从秘鲁的库斯科（海拔 3410 米）沿山脊北进通往马丘比丘（海拔 2350 米）的一条徒步线路，全长约 43 公里。作为印加帝国建于公元 1500 年的遗迹，马丘比丘身兼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和世界新七大奇迹两顶桂冠。20 世纪初，印加古道上珍贵而完整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吸引了考古学家、探险家和背包客的瞩目，他们寻找失落的古道、绘制地图，从此印加古道闻名于世。

2．难点

印加古道上主线、支线、副线错综复杂，且地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南美 6 国，如何跨国、跨区域高位统筹、有序推进对其遗产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成为活化利用的难点与堵点。实践中，管理制度的散乱无序、监控机制的缺失以及如何对全路段进行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成为古道活化利用的难题。

3．主要做法

（1）从单独到联合，统一步调促活化。

秘鲁是印加古道活化利用的先行者，哥伦比亚等 5 国也陆续制定修复与活化规划，但存在进展缓慢、步调不一等问题。2014 年，印加古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第一次由 6 个国家共同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申遗成功提升了印加古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古道修护和活化带来了更多关注和资源，跨国的高位统筹机制正在构建与实施中，如联合举办国际马拉松比赛等，促进了印加古道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弘扬。

（2）从散乱到规范，保护管控强活化。

因管理制度的散乱与监控不到位，古道承载过大，致使部分路段生态环境、历史遗迹遭致破坏、游客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突出。对此，秘鲁在坚持科学保护前提下合理开发的原则，制定保护区规划、修订管理条例以规范古道开发、运营。例如，从 2001 年起，秘鲁旅游部颁布的印加古道法规规定，前往古道必须要有注册旅行社及导游才能成行，而且古道每天上限 500 人，在强化古道保护的同时，让游客获得感大大增强。

（3）从片段到整体，经验共享推活化。

立足于旖旎的自然生态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秘鲁对库斯科至马丘比丘的古道（即狭义的印加古道）制定统一规划，广泛吸引社会投资以整合旅游资源，盘活古道沿线的沉睡资产。通过加大对文物的保护修缮、开发建设户外主题旅游新产品等举措，延续历史文脉，保存文化基因，推动聚落保存、古物重生，提升了印加古道的吸引力和体验度，使之成为享誉全球的旅游目的地。

（二）新西兰：夏洛特女王步道

1．背景

位于新西兰南岛北端的夏洛特女王步道（以下简称“女王步道”），是绵延于马尔堡峡湾三片主水域之一的夏洛特女王湾的海岸徒步路线，以船湾（ShipCove）为起点，延伸至位于小树林湾（GroveArm）内的阿纳基瓦（Anakiwa），全长 71 公里，是公认的私密性较强的休闲徒步古道。因气候适宜、设施完善，故吸引了大量徒步探索、野营体验、骑行、健身、摄影、邮轮旅行爱好者等的频频光临。

女王步道拥有高山、湖泊、水道、海滩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海鸟、海豹、海豚、小蓝企鹅、稀缺鱼类及贝类等野生动物资源，拥有成片的葡萄园及绵延数英里的灌木丛等植物资源；保有纪念库克船长的碑刻、小屋，毛利人要塞遗址，建筑、劳动工具、木雕等历史遗存，可体验的 EdwinFox 号等文化遗存；在原住民生活地，可欣赏或体验被称为“哈卡”（Haka）的毛利人独特舞蹈。步入 21 世纪，政府及公众认识到女王步道遗产资源蕴含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持续创新步道的管理体制，通过升级完善步道的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的公众前往休闲游览。

2．难点

女王步道有长达 14 公里（约占 20%）的私人所有权路段，1975 年颁布的《新西兰人行道法案》和 1990 年颁布的后续法案都未能化解对该路段土地所有权争议的问题，这亦成为保护利用的难点。此外，开发资金的短缺以及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平衡等问题，也是女王步道活化利用的难点和堵点。

3．主要做法

（1）从免费到付费，保障私产的共享性。

自 1979 年开放至今，因部分路段私人所有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增加了女王步道整体保护利用的难度。在 2005 年以前，新西兰自然资源保护局（即 DOC）与土地所有者（即私人业主）达成非正式合作协议，私人业主同意由 DOC 开发利用其持有的路段且不要求任何补偿，步道实行免费通行；2005 年，私人业主因旅游开发者获益而产生心理失衡感，拒绝执行原合作协议。为了解决争议，DOC 开始实施收费政策，收费标准由 2007 年的 5 美元/每人调整至 2010 年的 12 美元/每人，这其中，部分收入被用于对私人业主的补偿。至此，土地所有权问题虽未得到永久解决，但经过沟通协商，利益攸关者之间达成妥协，使女王步道的稳健运营得以保障。

（2）从资金短缺到吸引投资，保障利用的有序性。

从资金短缺到政府及社会组织进行多渠道资金支持，女王步道的管理与设施得到逐步规范与完善，这些保障了利用的有序推进。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DOC 不断投资对步道进行升级改造。此外，政府通过政策也鼓励社会组织的资金投入。在此语境下，步道修复、基础设施及服务完善工作按计划推进。这其中，步道坡度、表面和排水等得到改善；干流河道架设了桥梁，制高点建构了景观台和木椅；建设了嵌入当地民居特色的客栈、度假屋、汽车旅馆、帐篷营地及特色餐厅、野炊等多元化住宿、餐饮设施；提供行李运输服务，使背包客无负担徒步；此外，任何一个休息站点均可乘船返回皮克顿，人性化交通服务让游客全程无忧。在多渠道投资的推动下，女王步道基础设施和服务持续改善，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光临，而且促进了步道的可持续发展。

（3）从自然修复到人为恢复，保持环境的原生态。

早期，DOC 坚持自然修复、无人工干预原则，但是对女王湾及女王步道的环境管控显得乏力，使包括水质、近岸生态系统、陆地动植物生存环境、居住环境等遭致一定程度破坏。随着 DOC 重视对环境恢复与保护的管控，女王湾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并持续向好，打造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典范。

五、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的反思与启示

尽管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各异，目标却基本上趋于一致，那就是发挥古驿道价值的载体或媒介作用，通过活化利用激发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借此提升文化软实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从微观视角来看，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在背景、意义、资源、开发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审视国内外古驿道活化利用模式特点的差异性不难发现，保护是基础，利用显智慧。实践中，立足政治经济体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状，在法律法规、体制建设的保障下，正视不足、补齐短板，顺应时势、创新作为，推动活化利用难点、痛点与堵点的纾解，推动古驿道遗产从文化资源向精神资本的完美转换，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经济收入、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发展等多维度助推古驿道活化利用目标的实现。

从目标侧重点的不同，回答了为什么要活化利用古驿道这一根本问题。中国立足古驿道现状和需求升级态势，地方政府应积极主动调整角色，进一步明确自身作为古驿道所在地区域发展的政策供给者、产业引导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身份，通过“看得见的

手”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古道空间集聚，形成一个集生态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教育空间和交通空间“五位一体”、差序协同和有序发展的格局，推动古驿道点、线、面文化遗产生态效率的整体提升（如下图所示）。综上，从基础、体制和动力三个视角，提炼总结活化利用模式差异性的内在因素，旨在为中国古驿道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模式选择的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或对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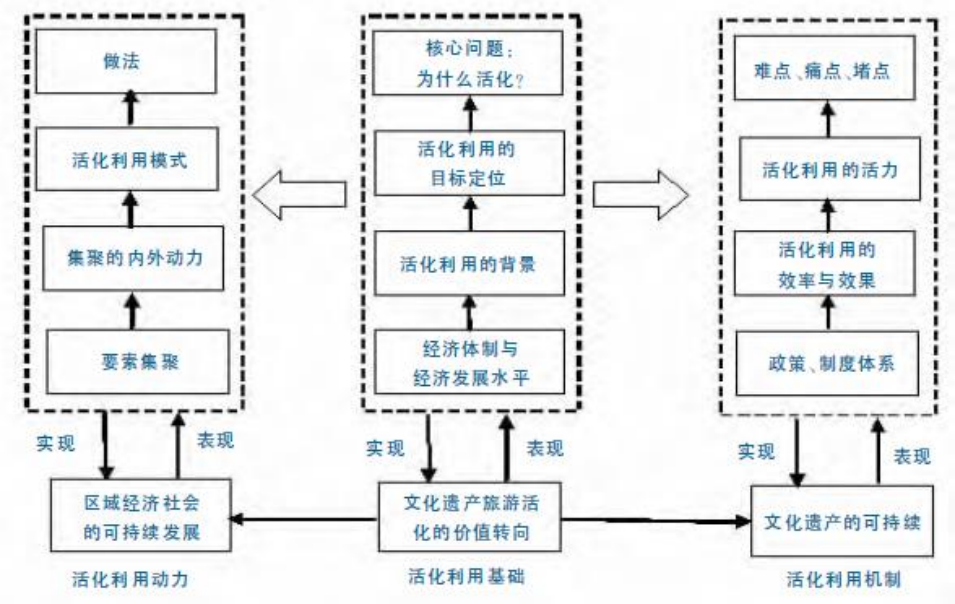

图 古驿道活化利用基础、体制与动力

（一）模式差异的根源来自基础的不同，并决定了活化利用的目标分野

从基础来看，作为广东千年文明史的活化石，中国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不仅有利于岭南文化的传承弘扬，而且有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以道兴村、以道兴粤”，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被赋予激活文化资源、坚定文化自信、助推乡村振兴，实现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时代使命。

中国徽杭古道的旅游开发已经历 10 余年，当前的活化利用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围绕“区域拓展+产业延伸+提质增效+治理创新”的思路来实施，其活化利用是立足传统观光游，渐次向文化旅游、全域旅游转型升级。

秘鲁印加古道所涉及的南美 6 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收入普遍不高，随着申遗成功，印加古道的经济价值引起沿线各国的广泛关注，秘鲁、哥伦比亚等国以“监管执法+联合治理+共享经验”为突破口，推动印加古道美丽风景与人文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带动产业投资、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提高经济收入是其活化利用的首要目标。

受制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新西兰女王步道的开发利用与社会共享受阻，进而引致资金短缺、生态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因此，将免费使用变更为付费使用，将收入用于对私人业主的补偿和对生态环境的治理，通过对利益攸关者权益的协调与平衡，不仅为女王步道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治理保障，而且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

（二）模式差异的拉力来自体制的不同，并决定了活化利用的做法各异

从体制来看，理念创新与组织创新是引领古驿道文化资源有序活化利用的重要保障。从理念创新视角来看，古驿道发展应坚

持文化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以公众参与作为遗产活态化利用、匠心化传承的核心支撑，以科技赋能进一步激活古道文化的现代元素，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从组织创新视角来看，古驿道发展应从规划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到运营管理等多向度发力，因时、因事、因地而异，适时“立、改、废”以矫正体制机制偏差，为古驿道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实践中，始终践行“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通过博物馆、遗址公园、城市公园、线上展览、文创产品和社会活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实施遗产资源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将古道建设成为各地方、各族群文化血脉的纽带，促进古道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弘扬，增进民族文化认同。

（三）模式差异的核心来自动力的不同，并决定了活化利用的治理差异

从动力来看，中国南粤古驿道和徽杭古道的活化利用，从政策供给、价值共创到社会参与都可以看出，其活化利用上承国家战略、下接区域高质量发展使命，因此它们的活化利用是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协同，充分调动企业、社区、游客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参与推进的全方位治理。

秘鲁印加古道的知名离不开考古工作者、探险家、背包客等各界人士的持续关注与不懈努力，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秘鲁政府从被动适应角色向主动作为角色转变，从发展理念、保护区划分、经营体制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在申遗成功以后，涉及印加古道的相关国家开始着手高位统筹，有序推进了印加古道的活化利用工作。

新西兰女王步道的发展思路是整合、共享和利用独特的岸线资源和丰厚的文化资源，但受土地所有权的制约，使整合、共享和利用工作受阻，后以步道使用费改革为契机，围绕利益攸关者权益失衡的治理，有序推动了女王步道的公司治理和经费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概言之，女王步道的活化利用具有上下结合、内外联动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李白薇.“痴人”说桥[J].中国科技奖励,2010,(10):50-51.

[2]唐曦文,梅欣,叶青.探寻南粤文明复兴之路——《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简介[J].南方建筑,2017,(6):5-12.

[3]喻晓蓉.文化遗产语境下有关南粤古驿道的几点思考[J].文博学刊,2021,(2):108-114+121.

[4]邱衍庆，汪志雄.风景园林视角下的南粤古驿道规划设计研究[J].风景园林,2019,(11):26-30.

[5]李飞,马继刚.我国廊道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2):136-140.

[6]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7]王克岭.茶马古道：世界屋脊上的文明见证[N].光明日报,2022-04-20.

[8]张晓萍.文化旅游与云南[J].经济问题探索,1998,(7):45-47.

[9]宗晓莲,戴光全.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J].思想战线,2005,(2):134-140.

[10]王慧敏.旅游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策动力——以长三角为例[J].社会科学,2007,(9):55-64.

[11]方慧.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律保护刍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3):125-129.

[12]潘宝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扬州的得失引发的名城文物保护的忧思[J].旅游学刊,1999,(3):50-53+79.

[13]曾军.文物型社区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旅游论坛,2009,(4):513-520.

[14]章锦河.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02):105-109.

[15]余青,吴必虎.生态博物馆:一种民族文化持续旅游发展模式[J].人文地理,2001,(6):40-43.

[16]汪芳.用“活态博物馆”解读历史街区——以无锡古运河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建筑学报,2007,(12):82-85.

[17]纪春礼,聂莉芹,聂元昆.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旅游业顾客价值重构[J].商业研究,2015,(9):116-122.

[18]孙九霞.文旅新消费的特征与趋势[J].人民论坛,2022,(5):78-81.

[19]高洁.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1.

[20]崇玉萍,张玉新,胡家迅.产业融合背景下徽杭古道徒步旅游提升路径[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1-24.

[21]鄢方卫,杨效忠,舒伯阳,等.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以徽杭古道为例[J].旅游学刊,2019,(10):93-105.

[22]张亮,夏淑娟.徽州古道遗产管理模式探索[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6):90-95.

[23]Unesco.World Heritage List"Searched text:route,Order by:Name of the Property"[EB/OL].https://whc.unesco.org/en/list,2022-05-07.

[24]OEI.. Executive Report: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Ibero-America Summary[EB/OL].https://rm.coe.int/0900001680a64ce5,2021-04-01.